



## 习近平与奥巴马新政下的中美关系

会议全文（未校正版）<sup>1</sup>

时间： 2012年11月29日下午4:00-5:30  
地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主办方：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孟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孟波，也是清华公管学院的教师。首先我代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欢迎大家出席这次活动。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2012年对于全世界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过去的一年完成了领导人的换届更替，这其中就包括了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中国和美国。在未来的五年里，中国需要为进一步发展与转型争取稳定的外交环境，美国需要走出经济困境，稳固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同时，中美两国也将会在地区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共同面临诸多挑战。合作与冲突并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的基调。在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将会有怎样的新格局？

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两位非常资深的学者，他们将会帮我们综合理解以上问题。第一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管杰弗里·贝德博士，以及来自南京大学的资深中美问题学者张睿壮教授，他们将共同为大家分析与展望新领导体制下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杰弗里·贝德博

<sup>1</sup> 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此为现场同传翻译稿，与演讲人的原初意思表达存在一定差异。

士将首先发言，发言时间约为 50 分钟，演讲之后将由张睿壮教授进行评论并主持观众交流环节。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贝德博士演讲。

杰弗里·贝德：谢谢孟波，谢谢张博士，谢谢各位老师同学们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相信下午这个时候有很多更有意思的事情大家没有去，而是听我来讲 40 到 50 分钟，我很感谢大家能够参加。一会儿我们还将有一个交流的环节。

谈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实际上四年前我就来到了这里。在去奥巴马政府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管之前，我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那时我们就和清华大学有了很深的交往。而且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也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我们的公共政策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

现在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有个很好的架构。在媒体上经常读到相关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摩擦和问题，或者是一些不友好的事情，比如几周之前，《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写的就是奥巴马总统最近造访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媒体视其为与中国的竞争。实际上，美国总统访问亚洲，无论他去哪个国家，可能都会被描述成为是其与中国竞争的一部分，好像就要给中国传达这个信息似的。考虑到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竞争、一种比赛，要么你就赢，要么你就输，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这就很发人深省，我们应该建立怎样一种中美关系的格局？有很多评论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写了很多文章。从卡特总统开始，在过去 30 年中我参与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工作中。实际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容易、没有无摩擦的时候。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有一段比较黄金的时期，但是如何去理解，也需要我们的重新认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新领导下中美关系未来这些年的发展呢？当然美中两国之间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我们看待问题有不同观点，我们也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利益，另外，我们中美两国也是世界上非常大的两个国家。

考虑这些不同的情况，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时候就要尽量避免相关冲突的发生。当然，人们并不想生活在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因素当中，也不想互相为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正确的现实角度来考虑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将要面对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克林顿国务卿在今年的一个讲话中指出，中美两国实际上是互相依赖的（Inter-dependent）。这个词非常重要，我们的经济，中国持有 1.3 万亿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有 600 亿，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也有非常巨大的增长，今年已经超过了 70 亿美元，双向贸易已经超过 5000 亿美元。因此在 21 世纪中，中美两个国家是共同走向了繁荣。21 世纪当中，中美走过了很多风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成果得来不易，我们是互相依赖的，这个词非常重要。

第二，两国之间在很多领域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像在伊朗、朝鲜核问题方面保持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这类问题一直是中美合作的核心方面，也是为什么在 1970 年代开始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开始访问中国，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原因，这些原因对于中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我们看到，利比亚的问题、埃以冲突等都影响到了整个地区的稳定，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推动中东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对于所有反对现存政府政权的活动都是表示反对的，我们也并不排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侵害任何国家主权的活动，中国都是反对的，因为中国持的态度是不反对任何国家现行主权，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都有很大分歧。这些的冲突虽然离我们很远，但仍然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南海的领土争端、东海领土争端等问题，都是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另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还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和不确定因素。同时，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需要很谨慎地处理相关问题。我们还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过去 20 年中的军费增长都非常快，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士对此表示关注，这些都是需要谨慎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者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是我们所谓的安全困境，很多人也读过这方面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其实当我们谈论到崛起的大国时，都可以看到存在不稳定因素，当然现在还包括军事力量的增加。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很多人都会谈论到由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发展会带来的一些安全方面的困境。我并不想低估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提的是，其实理论是理论，我们现在都意识到了这些风险的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夸大它的威胁，我们双方都应该彼此理解，这样的噩梦并不是真实的情况。美国并不想寻求遏制中国，而中国也不想代替美国成为一个世界第一位的压制其他国家的强国。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也建立了对话机制，能够帮助两国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对一些重要问题更好地进行交流，从而解决安全方面的困境，包括现代化、包括我们要使用太空的权利以及海上安全事务，当然还包括导弹防务计划等等。从两国来说都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官员参与到我们的对话中，在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任职期间，有一种新的对话机制建立起来。

第三点，我们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大国关系，一种主导性的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竞争，我们希望达成一种合作、相互依存，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而建立这种对话和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的主题就是互信。两国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增强战略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这一点是更加现实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要有目标的话，就要这样更好地实现，我们其实都不想错误地判断对方，我们两方都不希望被对方的行为感到惊讶，所以我们确实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和习近平将要执政的这个任期当中有些新的作为，特别是在两国关系方面，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奥巴马总统已经任职了四年，形成并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方法，针对亚洲和中国的一些措施已经制定出来，我觉得接下来的四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奥巴马政府还会持续相关的政策和战略，其主要的特性就是要正确地对待中国的崛起，同时也会接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

当然，中国的崛起在全球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当然对于国际组织，比如东亚峰会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希望增强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亚洲的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关系，我们希望能促进两国军事上的合作，同时我们要吸引中国的投资走入美国。我们希望避免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现在在市场当中已经看到有所抬头的趋势。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希望使用贸易不久措施，现在可以看到世贸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可能对针对这些方面有一些作为。所以我们认为，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强调的行为。

关于习近平对美国的做法，现在我不是还特别清晰，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了解到他个人做法的经验，他也还没有与美国相关领导进行过正式访问，这方面还有一个神秘的面纱。我们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关注，也就是需要更多人士进行研究。但我们现在看到，关于他个人的政策方面还是可以看到一点迹象的。

在这里我还是想强调一下习近平个人扮演的角色，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其他领导，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会有新的外交部长以及新的一批领导人将在明年3月份人大会议后产生，所以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习近平会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1997年奥尔布赖特与江泽民的会见就是一个重要的会面，当时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指导之下来开展的中美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中美会见的时候，美方的代表说中方代表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负责。邓和江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杰出的领袖，胡锦涛主席肯定也会在很多方面持续保持与前任领导一贯的做法和态度，所以我认为，从习近平这届领导中也会有一些连贯性。所以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任期中，我们的交流会更加顺畅，很多学者现在已经有一些反响了，他们会非常关注奥巴马在美国的一些做法，也就是在2011年对亚洲的态度和行为。

现在我们认为，重新平衡亚洲的力量对于中国来说会有一个新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更迭也是我们要重新塑造或者构建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特别是中国南海发生了一些事件，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安，当然其他国家也受到了影响。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官员们还是吸纳了现在大部分的主

流意见，当然现在我们觉得可能并不会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支柱，这是我预测的，从美方的做法来看，不会有太多其他的大的作为。在唐·当诺（音）的演讲中，对几周前奥巴马亚洲之行做出了一些评论，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态势，而不是希望带来一些新的军事上的行为和尝试。

当然，在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应该还会回归强劲的发展步伐。从2010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经济萧条的局面，两年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出现。两国这样的发展曲线在过去的五年中都保持持续的状况，所以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两国政界能够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两国领导人来说，可能都要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发展，奥巴马总统会花更多时间与很多领导人见面，来谈论经济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会更多地与中国的领导人谈论经济方面的问题，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有很多人一直强调从2008年以来有800万人失业，失业率非常高，这是他非常头疼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两国关系恶化最大的风险可能解决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局势问题。中国现在可能会更多地关注领土完整，在这方面，我们觉得中国可能会这么去做。国内的声音很明显，有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诉求，在中国东海、南海的局势也能反映出美国的态度，同时也能看出美国的利益，希望能和平解决中国的南海、东海领土争端。当然，如果说现在有紧张局势上升的潜在威胁的话，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可能会导致局势有所恶化，特别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还包括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一些不同角度的发展，进而导致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将受到影响。我们需要用冷静的头脑去解决这个问题，更多地关注在更大的情境下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而不是考虑其中一部分问题的解决。可能最近有很多人士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我们现在希望能看到张博士能否做一个评论，也希望能与在座各位有更多的交流。

谢谢大家的聆听。

张睿壮：首先我想感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在这里我也能够学到很多内容，包括这里有非常重量级的、也是我非常崇拜的嘉宾贝德博士。其实在我的角度和认识当中，他应该是属于非常了解中国的“支华派”的代表。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想把外国人分成两类，支持中国的和反对中

国的学者。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人们都认为他是“支华派”的代表，而且他也是非常卓越的专家，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形。在五年之前，当时我还在明尼苏达作访问学者，贝德博士就在那里给我们发表了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到他的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崛起，包括在非洲的发展，包括达尔富尔问题等等。当时，美国公众的情绪基本上都是反对中国在苏丹的角色，当时很多人都相信有种族清洗的说法，在他的报告中，贝德博士把事实讲了出来，给我们讲述清楚中国在苏丹的角色，他只是讲清了事实，澄清了很多问题和误解，也消除了一些反对中国的情绪。所以贝德博士当时的发言实际上非常非常能够给美国大众带来很多真实信息，让大家知道事实是怎样的、中国在非洲真正的角色是怎样的，都展现在了美国大众面前。

刚才贝德博士给我们非常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当然这是一篇信息非常丰富的报告，我会提出一些问题，当然有一些也并不问题。

第一，贝德博士刚才谈到，他觉得中美关系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不知道是他乐观呢还是怎样。是的，当前中美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所以美国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中美关系还是保持非常正常的情况，但是中国人怎么想呢？有一些事实、一些因素实际上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很长时间了，存在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美国人可能都觉得这些因素已经是正常了的，但是中国人却觉得至少就中国人的脑子里来讲，这些因素并不是正常的，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关税调查、对台军售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等等，我想，这些因素并不是正常的因素，而且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两国关系中应该存在的因素。

实际上我所担忧的是，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正在发生变化，并在改变这个关系。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时间里有一个因素在中美关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我们两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起到了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作用。在过去的30年当中，每当中美关系有严重危机的时候，几乎总是经济的因素显出来，起到稳定两国关系的作用，帮助两个国家克服所遇到的这些问题。但现在我怀疑这些经济的基础是不是足够强大，以及是不是同过去一样足够强大，足以起到稳定的作用。特别是最近在经济领域不断地发生很多问题，我就不举例了，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我对两国关系所提出的一个怀疑。

第二，我们谈到了安全方面进退维谷的情况。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了很多，谈到安全的进退维谷，实际上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这是国际关系真正的智慧所在。您实际上已经承认它表明了双边关系当中存在一些真正的风险，您又说到您希望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国际政治理论来讲，特别是从现实主义来讲，我们认为利益和权利是很重要的，您谈到了两国都宣布了良好的愿望，比如美国可以说我们没有遏制中国的愿望，没有制止中国发展的愿望，中国也可以说我们不想挤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等等，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通过对立建立一种战略关系，这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美妙并应该对其寄予希望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在国际政治中有一些法则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中都得以实现。举个例子，您谈到美国在亚洲、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重心平衡的问题，现在紧张的局势并没有完全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它。值得关注的是，现在美国对全世界说我不想这样，你已经这样做了，但又跟别人说我们不想这样。那我就怀疑了，这是什么目的呢？你已经这样做了，但你说你的意思不是这个，这怎么解释呢？

这是我听了您的讲话以后脑子中的一些想法，希望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我想您能说服我的，没问题。

杰弗里·贝德：谢谢张博士的评论，包括提出的相关的问题，您还记得我五年前的讲话，我很感谢。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同意您的一些批评，一会儿我会再解释一下。

实际上我也重点关注了您所说的一些问题，您刚才谈到，美国人很容易觉得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中国人可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走遍美国，实际上有很多美国人对于中美关系的很多问题也是不满意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觉得我们的关系是没有问题、是一片美好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人，特别是在政府中负责外交关系的人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观点是比较温和、比较务实的。当然，我们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在过去都有



处理过紧张关系的经验，所以我们也并不是觉得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您提出的某些问题确实还是不正常的，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实际上都是值得讨论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很新的问题了，从我出生开始，美国就向台湾销售武器，这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当然大家觉得这是很不对的，我只是说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对台湾交往以及与马英九的交往中，我们也看到对于台湾来讲，和大陆的关系也应该是他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很多人都觉得美国人好像总希望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开似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对于台湾和对马英九的态度和政策都是一致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马英九执政以来，他的政策和之前陈水扁的政权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

刚才您也提到了权利、利益的问题，当然这可能也与导致我们现在的紧张局势的原因直接相关。当然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些巧合，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必然会出现的，比如现在有一些崛起的大国，还有一些主导性的大国。如果任何事情都成了定数的话，我们就一定知道要与中国政府合作，一定要为政府工作，包括毛泽东当时的一些观点，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但是意味着一切都成定数的话，那就一切都是显示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看到急剧的相互依赖的现象，双方都能够从彼此身上获得利益，至少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对手。

刚才张睿壮教授和我本人都提到了安全困境的问题，现在美国并不想制约中国，但是张教授刚才说，我说的话可能和实际行为不一样。在那段时间我们可能是有一个政策上遏制的阶段是针对中国的，那可能是尼克松访华之前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反对意见，前苏联解体的时候，那时候政府的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军事上、政治上的同盟，当时也想遏制前苏联，包括与前苏联隔绝，希望前苏联与西方国家断开联系。但实际上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不一样，他们采取的态度和措施可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完全孤立，这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所谓的遏制。

但是我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并没有看到对待前苏联时的态度和观点，当然美国的军事领导者，特别是在我前一任工作的岗位上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做法，他们可能并没有寻求或者经常谈论与中国对抗的问题。正像张教授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知道军事困境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还将继续存在这样一些趋势。现在有很多声音，或者是有这种可能性认为今后会有一些遏制的情况。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真正意味着要去有这样的对抗、遏制的情况，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这样的措词，这个词汇听上去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行为，比如像我们向阿富汗、伊拉克所做的一些举措，好像是意味着我们在亚洲也会有这样的军事对策，听起来好像是对抗的意味，比如在中东有一些人不想来到亚洲，可能就是想逃离这样的词汇所带来的感觉。

回到刚才所说的话题，现在当政的人其实并没有仅仅关注亚洲，其实我们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那就是希望能够在与亚洲的对弈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这就包括我们要参加东亚峰会，我们希望帮助中国，当然也希望能欢迎我们加入东亚峰会，希望我们能共同做出决策，能够在东南亚做出更多的工作。比如与东盟+10成员国共同会见，对一些事件做出讨论。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增加与韩国的对话，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不仅只是关注中国。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一定代表我们意味的意图，现在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要进行政策的重新平衡，包括我们这一届政府可能会花更多的精力来谈论重新平衡的问题。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重新平衡可能更多的是要针对中国问题，我个人认为可能是错误的。我们要进行重新平衡、重新制衡，因为我们知道亚洲是一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对于今后来说也是最具有商机的一块地域，所以美国也非常关注东南亚国家。现在我们希望投入更多的资源，而不是说要更深地融入到或者参加到这个混乱当中去。我们知道，中国是东南亚的一个核心国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做更多的工作来澄清或者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所谓的重新平衡是希望我们能够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关注力的转移，是中国现在在这个地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也希望作为一个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裨益，而不是只是动用一些军队、武力来反对中国的崛起，当然也提到所谓重新平衡、重新制衡的问题，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

述，但我在 2009 年担任职位的时候经常听到很多评论，那就是在东南亚地区，人们可能不是很高兴看到缺乏美国的关注力，特别是如果美国缺少对东南亚的关注，他们可能并不是很高兴，他们希望看到有美国的关注，他们希望能看到有中国签署一些协议，或者是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促进东南亚的发展，当然还包括刚才张教授描述的情况，把他叫做政治上的现实派，他们看到中国的崛起。从另外一个层面和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小国的话，你的视角可能就不一样了，你的直觉可能告诉你，如果某个国家增长，可能会有一些对本国的影响，美国现在就声称要保持这个区域的稳定，持续在这个区域的关系和地位。

不管怎么说，我看到张教授频频点头，应该说是深信不疑了，现在他也可以再做一点评论。

张睿壮：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两人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谈论了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看看在座的各位是否有些问题要问。有一点是我同意你的，我想提出来，那就是在今后五年或者四年中，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和习近平第一任期中，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好的中美关系的出现，这点我们应该是达成共识的。

观众提问 1：我是田薇，来自于中央电视台。我非常感兴趣你是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主管，主管东亚事务。当时您说到在这个区域形成了这样一个关系，特别是能在东亚地区是一个重要角色的扮演者，您刚才提到重新平衡亚太地区的关系，这是不是一个既定的定义？其实我问过很多来自美国的专家，但是现在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你能就它的定义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吗？当然，如果它是一个明确的定义，那是不是意味着威胁？就是在很多角度重新塑造双边关系。

杰弗里·贝德：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 2009 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届政府就已经在以一种非常系统的战略性方式利用美国的资源投入亚洲，当然我们希望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现在可能是过重地投入到亚洲这块区域，导致东南亚、中东出现了一些军事行动，我不想说出名字，但是我们缺乏一些理解，很多人的观点是过度强调了我们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克林顿第一次出访是到亚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明显的信号，我们首要的关注就是亚洲区域。同时在土原办公室，

我们看到一个来自亚洲的领导去拜访美国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关系非常深刻，也就是东盟与美国之间的合作是在加深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步骤，都是我们想强调我们希望更多地关注亚洲这块区域。

其实奥巴马总统在 2011 年 11 月来到亚洲参加东亚峰会的时候才出现了“重新平衡”这个新的词汇，而并不是由国务卿提出，应该是当时美国的外交部官员提出的，当时我们也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美国公众有这样一个声音，希望有更多的舆论的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判断有一些可能是表面的，我 2009 年也跟随奥巴马总统一起来中国访问，实际上我们都快被媒体活剥了，就我个人来讲简直是灾难，美国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全世界的媒体都跟着我们转，什么中国崛起了、美国在衰落了，很多人都在问，中国这么大量地持有美国债券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就是围绕我们访问的这些媒体关注的主题，实际上我们还没怎么样，这 1.3 万亿就被炒作成这样了，所有的事情都被放在这个基调上，这就是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当总统来亚洲访问的时候，媒体第一个就是报道中国而不报道泰国或者柬埔寨，报道的都是中国。第二个，大家都想知道美国总统到亚洲来是要对抗中国呢还是要向中国俯首称臣呢？我想这些报道其实都是不对的，都是比较浅显的，实际上这些战略交流的人士、这些媒体人士是希望能炒出猛料来，能有吸引眼球的东西写在报纸上给人们看。实际上当时我们的访问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完成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包括军队的交流、发表联合声明等等，包括奥巴马总统也是第一次参与东亚峰会，对于相关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奥巴马总统对缅甸的访问也非常成功，取得了很多成果。

讲了这么多，我想，媒体应该明白，这个话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也希望媒体能够在报道中尽量保持客观和公正，无论是写中国还是写美国，那样才是正确的方式。

可能我没有正确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想帮您明白“重新平衡”这个词根是怎么来的，我想尽可能简单地来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很难

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它。刚才我也谈到了，正是美国看到了亚洲，包括中国在内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方，因此我们才把更多的资源从无意义的地方转移到了这个地区，恰好中国又处于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位置上。两国军方的交流和合作也是为了保持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观众提问 2：我想简单评论一下，实际上我个人也有相关的政府工作经验，做过负责双边贸易的工作。实际上在政府中的时候，和对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是需要非常谨慎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非常同意贝德博士刚才提到的，我们两国的合作都保持着良好的意愿，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加强，这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人希望破坏它，因为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问题。

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您是否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经历的在奥巴马政权前几年时中美关系包括外交政策的变化。

杰弗里·贝德：如果问别人的话，可能答案不一样，当然如果您问我的话，就我看来，我有很多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有建设性的角度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我并没有什么幻想，我们都是现实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国关系的和谐。我当时在政府中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也是奥巴马政权的一个主要做法，特别是 1980 年代和 1992 年的时候。1980 年，里根总统重新调整了和台湾、大陆的关系，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时两国政府都很不开心，我们做了多轮会谈，解决相关的问题，当时中美关系也出现了紧张的局势。实际上，克林顿总统在 1992 年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针对“天安门事件”提出了一些政策，这花了美国政府两年的时间才修复了和中国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在中美关系上犯的错误的，之后才有了布什总统的一些作为和取得的成就。很多外部的人会观察到，对于中美关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可能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一些困难所在，包括在 2010 年这些时候，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一些问题改变了方向。

实际上，有人说如果美国修改了过去的政策，我也并不相信。在 2010 年，并不是因为我们突然间想过来了，我们之前是在做梦，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对此我还

写了一本书。有些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做法可能促使美国有一些反映，包括朝核试验问题、延平岛问题等等，美国人会认为中国可能过度放纵了朝鲜的行为，甚至是放任，因而和韩国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情况，这就是美国做出的反应，包括克林顿国务卿的一些演讲就反映了相关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对整个地区的问题的反应，我们认为也是澄清了一些主要的原则，包括在 2010 年的一些所作所为。包括达赖喇嘛的问题，当时他在华盛顿，总统并没有接见他，当时奥巴马总统计划访华。一些人觉得美国修改了它的对华政策，而实际上并没有。这就是在 2009、2010 年时的一些情况，政策的不同并不是因为我们误解或者我们忘了，而是一些特殊的紧急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再回想 2010 年的话，实际上这有这样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 2010 年，中国还是要高举邓小平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实际上这样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戴秉国并不是说没事儿了就要重申邓小平的理念，实际上他包括整个领导层都看到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和韩国、和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和东盟等等的关系出现的困难，所以他才会写这样一篇文章，他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判断。邓小平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邓小平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他理解中国的历史。后来当我们有一些军事冲突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从世界的局面来考虑。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是有一些需要重新去审视的问题，我们经常问一些专家，你为什么在面临着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人士的时候会保持沉默？他会说，因为我们是名人，我们的电子邮箱中可能有太多的人给我们写信，像邓小平和戴秉国就很理解，他们要自己进行重新平衡，他们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议。

我可能有点跑题了，当然我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一些主题，我的一些同仁们经常读《纽约时报》上奥巴马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对于亚洲政策，我给他们进行了很多解释，其实在 2010 年没有非常大的改变，都是非常稳定的政策，对他来说，可能就像张博士这样，他也会写一些文章说是我说的，但是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观众提问 3：刚才您提到中国、美国都应该做自己的事情，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你对中国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振兴感到很乐观？美国是否

能避免经济再次下滑？也就是奥巴马总统是否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东可能还需要美国付出更多的资源。

杰弗里·贝德：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也记得胡锦涛在 2010 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在与总统见面之前与我进行过会谈，当时我们已经讨论过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向公众介绍这次出访或者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可以说，确实我们在很多层面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当然也可能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比如中美的经济关系，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有很多事情都混杂在一起，包括人权的问题，还包括大家都认为不是积极层面的问题，我们也谈论过了。当然我们也谈论到政治安全的问题，他认为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公众可能其实并不是那么关注公共关系的问题而是更加关注经济的问题。我说，你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并不是我，我无法去判断公众的视角，我没法说明公众的观点。但其实他说的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有很多讨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要关注人民关注的问题，急人民之所急。其实我们现在还讨论了许多其他的主题，主要就是如何能够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建立平等的竞争市场，这是在贸易的方面。

当然，中国所谓的重新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可能中国是一个非常依赖投资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是受市场极大影响的一个经济体，可能现在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市场无法吸纳所有的产能，只能依赖出口。中国的消费者现在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利，没有拥有应该拥有的足够资源来购买他们想要的消费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进入的原因。所以，如果能够重新平衡，可能中国有必要采取行动进入下一步的发展阶段，即所谓的重新平衡。

美国其实认为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当然这应该是由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来做出的一个决策，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非常难的，因为现在领导人的理解是有系统上的困难，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其实是政治上的意愿和能力的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在重新平衡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也涉及到利益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负面的效应，有时候可能还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核心理念和核心的原则。世行做了一项

研究，也是提交给了委员会，其实也是想谈论发展当中会涉及到的这些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去思考一下是否能够做出这样一些举措。

现在我们在华盛顿听到了一些人的不同观点，那就是非常需要能够有一个理智的预算，针对富裕人群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中国是否也会采取一些相关的政策。在美国，共和党希望能投票增加税收，可能这会减少收入，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到2014年之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可能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但是你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能够集体合作来解决一些困难，促进中美双方经济方面的关系更良性地发展，那么我们可能就有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当然，刚才张先生提到的安全困境，也能够得到解决。

张睿壮：现在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够了，非常抱歉，我必须要中断大家的提问环节了。我想再次感谢贝德博士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同时给了我们大量的信息，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再次感谢您非常直接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给予了评论。当然我不能说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已经清楚地理解了您的观点，也就是现在中美之间的交流应该得以加强，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学者、官员，应该进行更多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良好的中美关系。再次感谢。也感谢听众们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